

17087

鄂州文史資料

高理文罗南英伉俪回忆录专辑



21504/33

编 审 人 员

主 编：阮宝洲

顾 问：曾軼前

副主编：黄顺理 张全文

肖汉诚 庞洪志

编 委：闵剑秋 杨立才

姜锋青

理文学长：

奉读令媳转来大札，知兄伉俪
福体安康，无任欣慰。吾兄爱国爱
友之心令人感佩。唯经兄不洽时
势，迁延未决，或有难言之隐？兄
与彼相交有年，彼此相知，当能谋
以良策。但此乃大事，望吾兄能便
中回国一行而商一切，行旅当妥为
安排。匆之不尽。

即頌

府安

烏兰夫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

(原國家副主席烏蘭夫致高理文先生函)



国家领导人接见高理文先生时合影

左第四人起：赵君迈、乌兰夫、高理文、伍修权、高鸿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前 言

本专辑编入的《难忘的历程》、《往事回忆》，是在市政协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根据高理文先生及夫人罗南英女士提供的手稿由黄顺理同志整理而成，整理后文字亦经本人过目和校正。专辑中所记述的历史事实，是高理文、罗南英伉俪的“亲历、亲见、亲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步履艰辛，也记下了主人公人生道路的坎坷历程，以及晚年对祖国统一的愿望和付出的努力。

高理文（又名高素明），湖北省鄂州市华容镇高家大湾人。一九二二年一月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此后因受社会进步思想启迪，特别是“五卅”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当时青年学生中表现较为突出。一九二五年加入少共（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被我党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在苏联举行的中共“六大”会议上担任翻译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回国，受我党派谴往江西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据高理文先生记述，一九三〇年因他反“左倾”盲动路线，被开除出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在武汉“航空委员会”驻南昌空军总站担任苏联空军翻译。此时与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多年的蒋经国重逢，交往甚密。一九三九年六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赣南行政督察专署专员兼保

安司令，蒋认为高理文先生为人刚直，处事练达，于同年夏秋之间，利用其特殊身份，将高理文先生从航空委员会（此时航空委员会已由南昌迁到重庆等地）借调到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工作，主管文化、出版和宣传工作。后蒋经国离开赣南往重庆、东北、上海任职，高理文先生亦受命同行。一九四八年秋，蒋经国担任“上海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人，开展经济领域的“打虎”运动，委任高理文先生为督导员办公处秘书，在此期间的许多重要文告以及对外发言，都由高理文先生处理。后因“打虎”运动受阻以致失败，高理文先生以此事不可为，经友人介绍进“中央信托局”当顾问。随后被局方派往台湾“中央信托分局”视察业务，由于时局变化，未能返回。去台湾后，曾遭到跟踪监视，其间申请去美国探亲（子女在美国）未准。直至一九七二年因偶然机遇，方获准去美。高先生寄居海外，时时眷恋故国家园，切切思念亲朋故旧。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八年间，高先生先后三次与夫人罗南英回国探亲访友，曾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高理文先生现定居美国马里兰州，年八十六岁。

高理文先生的夫人罗南英女士（原名罗亚兰），是湖北省武汉市人。一九二六年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读书期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月，受我党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九年八月与高先生一同回国，并与高先生一起赴江西白区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〇年，又因同一问题，同时被开除出党。罗南英女士与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相处时间较长。蒋夫人是苏联人，初来中国语言不通，罗南英女士教她学习中文，关系较为密

切。一九四八年底随高先生一同去台湾，一九七二年又一同赴美国定居。现年八十四岁。

本专辑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姜昭文先生的热情帮助；高理文先生的胞妹高文英女士、妹夫廖玉阶先生提供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



高理文先生



高理文、罗南英伉俪旅居纽约时合影（一九七二年）



罗南英与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一九三八年于溪口)



罗南英女士

目 录

前 言	(1)
难忘的历程	高理文 (1)
(一) 我的青少年	(2)
启蒙教育	(2)
参加革命活动	(3)
(二) 赴苏联留学	(7)
起程前后	(8)
赴苏途中	(9)
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	(11)
在东方大学的时日	(14)
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当翻译	(17)
(三) 从苏联学习回国	(20)
回国途中	(20)
抵沪之后	(22)
死里逃生	(23)
被开除出党	(28)
以卖文为生	(30)
(四) 参加抗日行列	(34)
回到湖北	(34)

进“武汉航空委员会”	(37)
与蒋经国重逢	(38)
奉命西调	(41)
(五) 和蒋经国共事	(46)
应邀到赣南	(46)
创办《正气日报》	(49)
东北之行	(59)
上海“打虎”	(61)
(六) 去台湾以后	(63)
往事回忆	罗南英 (67)
我的家世	(67)
参加革命	(70)
赴苏联学习	(75)
回国后的地下生活	(81)
日寇入侵逼迫逃难	(88)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94)
去台湾的日日夜夜	(97)
在美国安度晚年	(101)

附 录

我所知道的高理文先生	徐浩然 (105)
------------------	-------------

难忘的历程

高理文

我是湖北鄂州市华容区高家大湾人，出生于光绪丙午年十二月（一九〇七年二月）。我家原有几亩旱地，每年种些棉花和麦子。父亲高海泉先在家务农，后到武昌纺织局做工，母亲在家种地。在我十岁以前，还帮助母亲到地里去做些零星农活，如拣棉花，或者将割下来的麦秆堆积在一起，以便大人束成一捆一捆的，好挑到村前的稻场上去脱粒。那时家里虽不富裕，但能维持生活。

过去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今天医药发达的社会，这句话虽不完全合乎事实，但生长在科学落后，医药不发达，尤其是过去的中国农村，一个人能活到七十岁，确属稀有之事。我同胞兄弟姊妹八人，幸存者三人。这就是我和一个弟弟高凤明（原鄂州市政协委员，于1989年病逝）、妹妹高文英（现在武汉任教），其余的都夭折了。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比我小六岁的弟弟，他患了一场霍乱病，上吐下泻，我母亲到处求神拜佛，当时我虽然只有八岁，也跟着母亲到庙里去烧香磕头，但并没有挽救我那小弟弟的生命，不到四天就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居然未受到霍乱的传染，而且能够活到今天，回想起来，这简直是奇迹。现在我已八十多岁了，度过了艰难的人生岁

月。“难忘的历程”，就是我对过去那艰难岁月的片断回顾。

（一）我的青少年

启蒙教育

我一直到九岁才进乡间蒙馆读书。第一任启蒙老师是我族房的一位哥哥，一年多后，因患肺病死了，时年才三十几岁。继任老师也是我族房的哥哥，年方二十几岁。那时农民子弟能念书的很少，一则当时的政府没有从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去考虑，重视文化教育；二则农民因家境不好，孩子过了十二、三岁，就已经是一个劳动者，为了生计，不能不下地参加生产劳动；三则那时的知识份子，没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背景，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只好回到乡下教蒙馆，一个学生每年所交束修（即学费），依程度之不同约合当时的银元一元到二元，一个蒙馆老师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五十元。从而形成一种“读书不如种田”的意识。我能幸运上学读书，除了家境条件比一般人要好外，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受一位至交好友的劝导而让我上学的。

我在蒙馆念了三年书，十二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只好离开乡间到武昌，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十三岁进入武昌一所半新半旧式的小学，全校仅有学生十数人，全是武昌纺织局和织布局的职员子弟，课程有算术、国文、英文，而且国文老师还教我们作诗，可惜我在这所小学仅念了一年书，后经族叔的介绍，转入武昌城内南楼养正小学，这是

一所由黎元洪捐资设立的私立学校。校长刘凤章先生，与黎氏为黄陂同乡。刘先生学宗阳明，在湖北学术界享有盛名，他虽为养正小学校长，但主要职务是湖北省立师范校长。养正小学的教师都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为刘先生的得意门生。学校分高小及初小两班，我被编入高小二年级，在同班同学中，我算是年龄最小的，大的同学，有很多已经结婚，或者作父亲了。学校课程排列与全省公立小学完全一样，教师的水准也很高，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年底毕业。

参加革命活动

一九二二年一月，我考进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并在该校完成中学学业。正是在这所学校受到社会进步思潮启迪，特别是“五卅”运动的影响，使我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参加革命活动的。

中华大学附中，是一所私立学校，分大学部、中学部。中学部四年毕业，属旧制。校长陈时先生，是湖北黄陂人，家中颇为富有，学校经费一部分来自他变卖田产，一部分来自海内外热心人士的捐助。陈校长在学校的时间很少，常年在外劝募经费，远至南洋一带，近则交结权贵，用各种方法请人捐钱。当时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就捐了一笔巨款。陈校长即以此款建了一座礼堂和十几间教室。为了报答肖督军，陈校长将礼堂命名为“肖公堂”。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发生后，我和同学施季高（施洋的胞弟）及另外数人，半夜起来，将那块“肖公堂”的牌子取

下来打烂了。这件事令陈校长大为不满，但在当时青年运动高潮的压力下，他也无可奈何。

在“五卅”运动发生的前后，武汉三镇即不断有青年及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主要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拒用洋货，尤其是拒用日货，人民受到唤醒。就在“五卅”运动发生后，同时又在武汉发生了反基督教运动。起因是教会学校的洋人歧视华人，压迫学生，甚至强迫学生信教。我就是反基督教同盟的积极分子之一。

武汉的学生运动，一开始就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和领导。当时对学生运动发号施令的，则为少共武昌地方委员会，地委书记是林育南，委员有李子芬、黄敬等；具体组织指挥者有胡彦彬（湖北黄冈人，是中华大学部的学生）刘昌群（我们一群年青人都叫他麻哥）等。当时在青年学生运动中比较活跃的份子有施洋的弟弟施季高（施为早期的共产党员，是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后为北洋军阀吴佩孚所杀害）、武昌商科大学刘胤（后改名为李麦麦，在复旦大学任教，抗战时死于重庆）和陈绍禹（由莫斯科回国后，改为王明），还有武昌高师附中的伍修权。由于我当时思想表现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同学胡彦彬介绍，加入少共（即共青团）。此后，工作更为努力，经常奔走于各学校之间，联络同志，举行集会。当时武昌城内的中学不少，除武昌高师附中、省立一中、二中之外，还有私立的共进、启黄、武汉（校长是董必武）等学校。商科大学（校长郭春祺）是反基督教同盟活动的大本营（即三道街）。当时陈绍禹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由于这一运动，武汉的教会学校几乎全